

二十一世紀評論

從「新清史」到滿學範式

項飆 劉小萌
Mark Elliott

項飆：今天的主題，像我們在告示裏說的，是關於民族研究。民族研究，尤其是現在中國的民族問題，是一個相當重要、相當複雜的問題。正是因為它如此複雜，我們覺得要泛泛地去談可能很困難，可能也達不成有效的交流。所以我們今天是要從一個在中國歷史上相當特殊也相當重要的一個民族來對民族問題進行反思——這就是滿族研究。大家也知道，滿族研究從原來在學術界或者在公共意識裏相當邊緣的一個案例，到2000年以後，成為一個在歷史學、民族研究甚至政治學裏面討論最多的一個子學科。所以我覺得滿族研究不能夠僅僅被看作是對單個民族的個案研究，而是應該把它看作一種範式（paradigm），看它怎麼樣能幫助我們理解一些民族問題。民族問題很複雜，可能沒有答案，也很難達到結論，但是我們至少可以討論如何提出好的問題，如何有效地去探索有效的假設。

坐在我左邊的劉小萌教授，是漢語世界關於滿族研究的代表，原來在中國社會科學院的近代史研究所，去年榮休之後，在繼續學術研究的同時，也在吉林師範大學開展一個全方位的、從本科到博士、推進滿文教育、滿族史教學的工作，為下一步的滿族研究打下非常堅實的基礎。

坐在我右邊的歐立德（Mark C. Elliott）教授，是英語世界裏面關於滿族研究、也是關於許多人說的所謂「新清史」的代表——這裏我插一句，我前面講到滿族研究可以作為一個“paradigm”，我現在所說的「新清史」可能是這個

* 是次對談於2016年5月20日假香港大學舉行，是香港大學文學院與香港人文社會研究所主辦的“The Critical Dialogues about China”系列對談活動之一，主題為“Ethnic Studies in China”。對談特邀嘉賓為哈佛大學歐立德（Mark C. Elliott）教授與中國社會科學院近代史研究所劉小萌教授，並由牛津大學項飆教授主持。現場由香港大學文學院協助錄音，《二十一世紀》編輯室將錄音整理成文字稿，內容由三位講者審讀修訂。是此對談活動由香港大學金由美博士、李紀博士、王迪安博士、張樂翔博士共同組織，在此一併致謝。



左起：歐立德、項飆與劉小萌。（圖片由香港大學文學院提供）

“paradigm”裏面的一個部分。這個“paradigm”背後可能還有很多更複雜更有效的交流，不能被所謂的「新清史」所代表。這個正可能是我們今天想展現的東西——現在不管他自己同意不同意，大家都把歐教授當作英語世界裏面「新清史」的代表。他是哈佛大學東亞系和歷史系兩個系的講座教授，也是哈佛負責國際事務的副教務長。所以我們也很好奇，是不是現在哈佛在處理各種多樣文化時也採取了一些“Manchu ways”？

我自己是完全不懂這個專業的，但是我很想強調，今天我們在台上的這個一個半小時的對話，必須至少上溯到1990年。就是說今天這個對話是他們從1990年開始的，是二十多年以來不斷對話的一個延續和一個片段。這個歷史背景很重要，所以我就想先把這個時間放回到1990年或者更早。我的第一個問題就是想請兩位講一講滿族研究是甚麼？你們當時為甚麼要選擇這麼一個邊緣的話題，然後你們在中間又看到了甚麼？是不是請劉教授先講？

一 滿學研究的意義與範式

劉小萌：按大陸的原則是先左後右，因為「左」比「右」好。所以那我就先講。首先我要感謝香港大學。為甚麼這麼說？因為我跟歐立德教授已經認識幾十年了，在不同國度從事着同樣的研究，一直想找一個對話機會，前幾年曾經一度有過希望，聽說哈佛的一些年輕老師還是研究生準備籌備一次對話，圍繞着「新清史」，可是後來大概是因為經費沒落實，就落空了。沒想到，今年初香港大學徵求我意見在這兒舉行對話。首先我感到很興奮，當即就答應了，我說那你就看歐立德教授有沒有時間，因為我知道他比我忙。其次我也有些擔心，因為這個話題在北方是一個熱點話題，尤其在東北、北京等地，是研究清史、滿學的傳統地域。我跟歐立德教授都是屬清史、滿族史研究的

學者，可是在南方，這個話題會有多少人關心？前些年我在台灣開一次清史會，廈門大學一位有名的學者——我當然不能提他的名字，因為大家都知道——在會議休息期間，他走到我面前，質問說：「有滿族嗎？還有甚麼滿族？滿族早漢化了！」我一下子就楞了，心想：你一個大學者，怎麼對北方民族的歷史和現狀無知到這種程度！我覺得沒法跟他對話。這次來港大發現，咱們還有這麼多的教授、知名學者，也包括年輕的同學關注這個話題，所以我覺得非常難得，也是我首先要向學校、向在座各位嘉賓表示感謝的。

剛才項教授說這次對話是圍繞民族問題展開，那我和歐立德教授畢竟是從事清史、滿族史，或者說大一點兒是從事滿學研究的，我想，這應該是這次對話的切入點。在給我的幾分鐘裏，首先想表述一下我所理解的滿學是甚麼。簡單地說，滿學就是滿族學，簡稱滿學，就是指以滿族為中心、以滿族為研究對象的一切學問，如歷史、文學、語言、宗教、藝術甚至書畫等。在滿學研究中，無疑最重要的是歷史，而歷史研究又離不開滿文，所以在這方面我和歐立德教授是有共同點的，因為我們研究清史，都注重從滿族角度來研究，並且都注重利用滿文文獻。

滿學研究的意義何在？我概括為兩點。第一，在中國五十六個民族中，滿族是很特殊的一個民族。根據2000年人口普查，它的人口超過一千萬，在各民族中位列第三，僅次於漢族、壯族。可是在十七世紀初滿族入關以前，其人口究竟有多少？學界一直弄不清楚。前輩學者做過考證，後來卻發現估算的人口太多，最終還是通過滿文檔案解決了這個難題。順治五年（1648）的一件滿文題本有精確數字。當時滿人入關未久，全部壯丁，當然不包括婦女兒童，大概十六七歲到六十歲吧，有五萬五千人。八旗滿洲壯丁當時是五萬五千人；八旗蒙古壯丁是兩萬八千人；其他二十多萬是漢軍旗人和漢人奴僕。所以清朝入關時，八旗就是一支以滿洲人為核心、可是在人數上是以漢人為主體的軍隊。就是這五萬五千滿洲人，某種意義上征服了中國。當時中國漢人有多少？一般估計是一億人口上下。這麼懸殊的人口比例，為甚麼能成功？歐立德教授說過，這是一個歷史之謎。所以我想，作為滿族史起點的，就是要研究滿族人以如此少的人口，為何能夠建立這麼一個龐大的以漢人為主體的多民族國家。這是第一點。

第二，就是滿族人的遺產。大家都知道，在近一千年中，中國歷史的大部分時間都是少數民族王朝在統治。從遼契丹、金女真、元蒙古到清滿洲。在北方民族所建王朝中，清朝又是統治中國時間最長的，將近三百年。它的成功之處在哪？又是一個歷史之謎。至於滿族人留給我們的遺產，我覺得是多方面的。

首先是政治遺產。現在，中國學者與美國「新清史」學者分歧比較大的一個問題，就是關於中華民族的形成——在統一多民族國家的建立與形成過程中，滿族人究竟起到怎樣的作用，以及如何評價這種作用。我想，作為政治遺產，包括龐大的疆域，也包括眾多民族及其多元文化，都是隨着滿族人的清朝來實現的。

我所理解的這個政治遺產，不單是歷史的影響，在許多方面還延續到現在。滿族人統治中國，基本制度為兩元結構，即用漢制也就是州縣制治理漢人，同時用少數民族制度治理少數民族，後者又包括用八旗制度治理滿人，用理藩院管理蒙、藏、回等眾多民族。中國發展到現在，在某種程度上還是延續着這種兩元結構。這話怎麼講？許多少數民族聚居區至少名義上屬國家民族事務委員會兼管吧，每個少數民族在國家民委都有代表，國家民委的官員大概是比較多的，因為主要民族都要有一個副主任。與這個體制相呼應，一直到省、市、地、縣，都有相應的自治區、自治州、自治縣。滿族沒有自治州，可是有自治縣、自治鄉、自治鎮。這說明在某種程度上，兩元結構的遺存猶在。

甚至在一些具體問題上，我們也能感受到這種政治遺產的影響。今年5月16日是文化大革命爆發五十周年。文革十年浩劫，當政者大搞階級鬥爭，整人的話，首先就是講家庭出身，查你的家庭出身。你們家是地主呢，還是富農？是資本家呢，還是「歷史反革命」？當時叫「查三代」，就是查你本人的成份、你父親的成份，還有你爺爺的成份。後來我研究滿族史才發現，這個「查三代」是從雍正皇帝那裏一脈相承下來的。雍正皇帝整頓八旗制度，為防止漢人混入，建立查三代制度，凡是參加科舉、當兵、做官，都要查三代。這種做法不僅延續到清末，而且如眾所知，在中共建政後一度發揮到極致。這種現象之間是否有直接關係，我不敢斷言，但貫穿其間的依人的血統高低決定對其棄取的宗旨，是顯而易見的。清朝政治遺產的影響有利有弊，當然遠不止這些。

我跟國外學者交往，包括日本、美國、法國、韓國的學者，尤其跟日本細谷良夫教授長期從事滿族歷史與現狀調查，由衷佩服他對工作的投入和癡迷。我問他：「為甚麼你對我們的歷史那麼感興趣，比我還投入？」他的回答出奇地簡單：就是為了解中國。我們要了解現實的中國，不能不了解距離我們很近的清代。從清代到民國，再到現代，許多現象之間有着千絲萬縷的聯繫，包括制度建設、內外政策等都有聯繫。這就是政治遺產。

其次是文化遺產。關於這點我就不展開了，因為正是由於清代建立的大一統國家，囊括了五十六個民族（五十六個民族是現在的官方說法），正是由於清帝國，以這些民族為載體的多元文化才全部納入到中國版圖。

最後是史學遺產。歷代統治中國的少數民族，除了滿族，留下的本族文獻都較少。尤其作為遊牧民族、馬上民族的契丹人、蒙古人，留下的史料更少，加上歷代兵荒馬亂，半個多世紀以來變本加厲的政治運動，尤其文革浩劫，都造成無法彌補的損失。相比之下，滿族人的史學遺產雖也遭受到嚴重損毀，但存世者仍非常豐富，僅中國第一歷史檔案館收藏的滿文檔案就有兩百萬件以上。在北方各省、台灣，以及日、美、俄等國，都保存有數量可觀的滿文檔案、文獻、文物。另外，還包括清朝用漢文編撰的大量與滿族歷史文化有關的典籍。我們對如此豐富的遺產進行研究，其意義絕不限於滿族本身，而是涉及到諸多民族的歷史文化。所以我想說，研究滿學，包括利用滿文從事研究，實際是了解中國多民族與民族關係——首先是北方民族關係——的一把鑰匙。因為我們從清代滿漢關係問題中得到的諸多啟示，有助

於理解歷史上的多民族關係。大家也知道，「民族」是近代傳入中國的一個外來詞。而中國作為一個多民族國家，由來已久，但是可資利用的歷史文獻卻明顯不夠。滿族留下的豐富歷史遺產，給我們提供了連結歷史與現實的一條紐帶、詮釋中國多民族與民族關係的一把鑰匙。這是我想說的一點。

至於研究現狀，不想多說了，因為一會兒的對話可能要涉及，而且歐立德教授的國際視野比我開闊，所以這個任務交給他。至於治學，有時間再談吧。

項飆：行。歐教授。

歐立德：我也跟劉教授一樣謝謝各位，在百忙中抽出時間到這裏來跟我們一起坐一會兒，談談滿學和民族學之間的關係，然後是滿學在中國歷史上的地位和意義等問題。我也很高興可以回到香港大學來，大概四年前，梁其姿教授請我來演講。每次有機會回來，我都很樂意答應，尤其是這次受金由美博士邀請，她以前上過我的課，我不太不好意思拒絕。然後她說劉小萌也要來。我跟小萌認識——他是我的師兄，都是師從王鍾翰教授，那是1990年，那時候我在中國人民大學檔案學系，不在中央民族學院（那時候不是民族大學，還是民族學院），但是我在那之前就已認識王教授。我曾在東京讀書，然後在東洋文庫做研究，有一次王教授過來，我就有機會認識他，他說到北京一定要找他。之後他說特別安排了一個小規模的座談會，讓我介紹一下我想做的研究，就是關於八旗駐防的研究。就在那時候我認識了劉小萌、定宜莊、屈六生，還有一些研究滿學的朋友。

像項教授剛才說的，今天的這個對話其實延續了二十五年。我們常常有機會見面，但是從來沒有這樣的一個機會交流，所以非常難得，謝謝。

剛才劉教授提到，沒想到在香港、在南方，居然有人對滿族有興趣。其實我覺得有一個很好的解釋，這個解釋我後面要做說明。今天的這個對話不只是我們兩個人之間的對話延續，因為滿學一直是非常國際化的專業。對於滿文和對於滿洲人的歷史感興趣是從中國開始，但從十七世紀起，已經有西方來的傳教士開始研究滿文和滿族歷史、文化、宗教等。大概是兩百年前左右，在巴黎有一個我們能夠認同是西方滿學的誕生。那時候，1814年，就有年輕的學者雷慕沙（Jean-Pierre Abel-Rémusat）在法國的法蘭西學院成立了最早的專門研究中國文學和語言的講座，其實那個人一面是講中文的文學和語言，另一面是講滿文和滿洲人的文學。從那時候開始一直到現在，滿學在歐洲、俄國、日本都非常盛行。二十世紀主要是在德國，然後在日本。二次大戰之後就傳到韓國，歐洲則主要集中在德國。然後很晚美國人才開始對滿學感興趣，才開始有人在美國教滿文，最早大概是在二十世紀60年代。所以這個專業一直很國際化，我跟劉教授在日本待的時間比較長，我們看日本同行這方面的文章和書也比較多，對我們的影響也相當深刻。這跟我們今天要討論的題目也有關係。

奇怪的是，大概二十年前吧，在美國做滿學研究的話，基本上已經沒機會了，歐洲也不樂觀了。在德國教滿學的三大教授，分別在柏林、波恩和科隆，他們退休之後沒人接班；威尼斯有人教滿文，但那個人退休之後也沒人接班，而德國也沒有人教滿文，美國就只有哈佛大學有人教滿文。這跟我在1980年代做研究生時的情況很不一樣，可以這麼說，當時的情況相對好一些，但是二十世紀末變得有一種危機。沒想到不到二十年，情況就很戲劇性地變得不一樣，目前不止在哈佛，而且在密歇根大學、華盛頓大學、耶魯大學等地方，都有人教滿文了。

關於對滿學的態度出現明顯的轉變，或許我們也可以討論，因為我覺得這個跟民族學也不是沒有關係。所謂「滿學熱」，我們可以追溯到甚麼時候呢？也許不是《還珠格格》就是《步步驚心》，不是《步步驚心》就是《甄嬛傳》，大家都很願意看這些「辮子戲」，看那些人打扮成滿洲人的樣子，以致那些有關清朝朝廷的電視劇這麼受歡迎。我想這與1980年代以後大家對於民族和民族認同這些問題愈加感興趣的趨向有關。

剛才項教授請我們說一下怎麼會對這些問題、對這個專業感興趣。就我來說也是出於偶然，因為我做研究生的時候有機會到瀋陽留學一年。那時候在大學上過中國歷史的課，知道有清這麼一個朝代，但是也沒有甚麼研究，學了一點中文也還是很初級。在瀋陽住了一年之後就發現其實滿洲人很有意思，人數這麼少，統治中國這麼長時間，這要怎麼解釋呢？然後，有人說滿洲人「漢化」了，但與此同時，清末又有「排滿」的情緒，於是我想到一個問題：如果滿洲人都漢化了，怎麼又會排滿呢？如果真正漢化了，誰能認清楚誰是滿洲人呢？應該是還存在一個甚麼東西，把滿洲人和漢人判然分開的。那是甚麼東西呢？這個問題想久了，加上學了滿文，看了史料之後，我就開始想，如果把滿洲人當作值得研究的歷史主體的話^①，那會怎麼樣？如果我們想那麼做的話，該怎麼做？從那個角度來研究的話，我們會發現甚麼？對於中國近代史——我說的近代史其實指的是“early modern”，前近代，就是從明末清初一直到清中葉——會有甚麼新的啟發？當然是希望有新的啟發，但不見得一定有；當初開始學的時候，也沒有保證，花這麼多時間去學，不止要學中文，還要學滿文，這個到最後會有甚麼結果？可以這麼說，這是一種冒險。

那時候我是在加州大學伯克利 (Berkeley) 分校讀書，決定研究滿學和八旗制度，魏斐德 (Frederic E. Wakeman) 教授是我的導師。有一次李中清教授從南加州到伯克利來，我們第一次認識，他問我：「你想研究甚麼題目？」我說：「我大概是要研究八旗制度了。」他說：「很好，應該要有人研究。」我至今還記得那次在走廊的那個對話，很受鼓勵。他可能忘了，但我記得很清楚。當時我覺得做這個專業應該不會有甚麼政治問題，因為是清朝，封建社會、封建時代已經過去了，誰也不管。沒想到以後的「新清史」會變成這麼一個熱門話題，尤其是在微博、豆瓣上，甚至在社會科學院的網站上，有人那麼激烈地談。當然有人罵「新清史」，說它不科學，不準確，甚至罵我，說我是甚麼東西。有時候我也看得不是很高興，但總覺得這個畢竟比誰也不理你要好，至少有人在

看我在寫甚麼東西，這多少促進同行更加注意跟我研究相同問題的國內同事的研究，用新的眼光去看像劉小萌、王鍾翰、定宜莊等專家寫的書和文章。我們的研究以前屬於清史的邊緣，現在可以說已經不是邊緣了。

這就回到原初提到為甚麼在香港要舉行這麼一個對話，其中一個原因是香港也是邊緣。邊緣，或者說周邊，很重要。要知道最中心的那個地方在發生甚麼，人們在想甚麼，只要先看周邊的地方，就可以知道。因為在中心誰都知道的那些事實，用不着明確地說明，但在邊緣卻不是那麼明顯，人家還要解釋為甚麼我們是這樣做、這樣想。換句話說，探討邊緣的歷史就會發現，它會有助於了解一些很重要的、一點都不是邊緣的議題。

作為範式來說，我想講兩點。第一是語言，如果不研究、不學好語言，你的學問不會做得好。你問我任何一個學生，他們都會跟你說，我就是這麼一個教條主義者。第二，滿學給我們的一個啟發是，要從「他者」的角度去研究歷史，去想歷史問題，這是非常有用的一個方法。然後，再從邊緣看中心，這不只是我一個人的想法，復旦大學文史研究院的老師也編過一本書，《從周邊看中國》^②，講的也是類似的道理。蘇軾有一句話：「不識廬山真面目，只緣身在此山中」，其實也就是這個意思。

項飆：好，謝謝。一會兒我很想聽到大家的問題，使對話進一步繼續。但是在這裏我先問一個問題，歐教授給了我們非常好的、跨越長時段的、全球的滿學研究傳統的回顧，從巴黎開始，一直到現在的全球化的興趣。在宏觀上，我們是可以建構這樣的學術研究史，但是我想這個歷史的內部是有很多斷裂的。比方說具體的研究者，他不一定總知道以前有巴黎的這麼一段，或者說不知道俄羅斯對這方面的興趣；尤其是在中國大陸的學者，他的出發點不是作為這麼一個學術傳統裏面的學者去研究這些問題，他首先覺得自己是作為中國的歷史學家來研究問題。我想劉教授講到遺產問題也是代表這樣的取向，所以我就想先請劉教授回應一下。像以歐教授代表的這樣一個姑且稱為「西方學者」，他這種學術傳統的意識很強，他的問題很大程度上也是一種學術上的好奇，比方說為甚麼少數人能統治這麼多人，為甚麼說滿洲人漢化了又有排滿，這些都是一種好奇；而且有很強烈的從邊緣看中心的視角。但是我們自己可能有另外一個傳統。我想知道，你覺得跟西方同行交流之後，你看到了甚麼以前沒有看到的東西？或者說，從你現在在廬山裏面看，你覺得廬山外面那些人是不是又有他們的盲點？

二 「求同存異」與「從邊緣看中心」

劉小萌：這個題目夠大的。所以我還是從一句中國傳統的話來講，原則就是四個字：「求同存異」。我們先談「同」，然後再談「異」。我們過去為甚麼某種程度上說滿族史研究或者說滿學研究比較邊緣化？原因是多方面的。

首先，在清朝滅亡以後，中華民國的史學敘事基本是對滿族統治完全否定，代表作就是蕭一山三大本的煌煌巨著《清代通史》，他把清代納入近代史，講中國近代史，基本線索就是民族革命。他把民族革命劃分為三個階段：清代就是反滿，清代以後就是反帝，到抗戰時期就是反對日本帝國主義——貫穿近代歷史的基本線索就是這個。在這種權威話語影響下，對滿族歷史的輕視和歪曲經歷了很長時間，這就不細說了。剛才歐立德教授談到滿學研究在前些年的困境，後繼無人，對此我深有同感，當時在大陸面臨着同樣的狀況。1980年代初，除了我們幾個跟着王鍾翰教授的治學路子走下來，真正用滿文做研究的人，除了中國第一歷史檔案館專門從事滿文翻譯的人員外，把滿文與史學研究結合起來的人鳳毛麟角。後來有日本學者、我們兩位的好朋友和老師、今年已經八十二歲的細谷良夫教授。前些年，他曾經多次問我：「我們跟誰去對話？你給我介紹介紹，中國的年輕一代，跟誰對話？」我掐着指頭數數，確實不好說，真切感到後繼無人的危機。另外就說到歐立德教授——你們說的「新清史」代表人物，他陸續培養了一些滿文比較好的學生，到北京的檔案館學習，這樣就加重了我們的危機感。美國在培養，日本也在培養，日本從事滿學研究的人雖然比較少，可是熟練掌握滿文的一批中青年，基本上已經形成梯隊。

歐立德：現在包括東京大學……

劉小萌：東京大學的杉山清彥也是一個例子。日本形成了一個研究梯隊。當然哈佛大學、美國，也形成了一個梯隊。所以從我這兒講，危機感非常強。

歐立德：該你們了！

劉小萌：所以我們也開始做一點兒追趕工作。我去年從社會科學院退休了，這之前我已經受聘到吉林師範大學，它在大陸只是一所普通高校。因為在東北，研究滿族歷史文化也有傳統。另外很重要的一點，就是我的一些教學理念，如果在北京高校，恐怕很難貫徹，因為你不過就是一個兼職教授，一個教書匠。在吉師大就不同了，他們沒有自己的資深教授，所以很尊重我的意見。三年來，我們還是做了一些有益工作。到今年我已經招了八個博士生。我去該校之前這個專業的研究生沒有非漢族學生，現在我招的博士生裏，錫伯族有兩個，還有蒙古族的、滿族的，儼然成了一個多民族大家庭。我特別感動的是，有的錫伯族孩子是辭掉很好的工作，從新疆來的。所以我感到，在中國，談到民族認同也好，民族責任也好，確實是有。他們為了繼承自己的民族文化，研究本民族歷史，可以放棄優越的生活條件，到這麼一個小學校來學習。而我們在追趕的道路上還是很有成績的。我到校後，先把日本的楠木賢道聘為常任教授；在大陸很有名的清史學家杜家驥教授退休後也來校

教書；我還引薦了日本早稻田大學的吳忠良博士。當然，我們的現狀不要說距離哈佛大學太遠，距離香港大學也太遠，可是我覺得在發展滿學研究上，充分利用現有條件努力做一些培養工作，還是有希望的。所以我也想借這個場合表達一下自己的願望，諸位同學老師，凡是對滿族歷史文化、東北地方史感興趣的，歡迎到我們學校進行交流。

項飆：那我追問一下，除了培養之外，在國際視野下，你自己有甚麼戰略性的目標？就是說我以吉林師範大學為中心，如何把中國的滿學做成和別的地方不一樣？有沒有自己的特色、特長，有沒有戰略性的定位？

劉小萌：首先我想補充兩句，就是滿學研究長期以來是比較邊緣的，對此我們都深有體會。我和定宜莊教授同屆，都是王教授的開門弟子。正是由於「新清史」興起，所以現在大陸也好，台灣也好，以這兩個地方為重點地區，一批年輕人開始對滿學產生興趣。所以從某種意義上可以說，滿學研究從一個原來很邊緣的處境，到現在成了一個視野的中心。5月在大陸是答辯月，大陸碩博士研究生非常多，北大的、人大的、民大的，包括東北等地高校的，相當多學生的論文是圍繞八旗、滿族史來寫，儘管他們的老師未必熟諳此道，論文水平也參差不齊，但至少說明大家都認識到這個專題的重要性。現在東北的幾所大學，以及北京的人大、民大，都有一些老師專門教授滿文。所以在滿文人才的培養上，至少就這點來說，長期以來的危機已經大為緩解。這是一個非常國際化的互動的結果。這是我想強調的一點。

至於推進國際化的具體構想，首先遇到的一個難題就是中國的高校體制，從上到下，基本上是用行政手段辦教育。國家的教育投資按高校等級分配。像北大、清華，國家一年投入280多億，在教育部屬二百多個高校中，中央戲劇學院是經費最少的，因為是文科院校，但也有30多億。可是像吉林師範大學這樣的省屬院校，實際上就是一個億左右。你想，287億跟一個億相比是甚麼概念？所以要想在科研上做出優異成績並推進國際間交流是比較困難的。

第二，我們在生源方面也面對困難。大陸的優秀生都去了哪兒？不用說今天在座的大陸生都很優秀，其中一些優秀的恐怕香港也留不下，他們會去美國深造、就業，或者去歐洲哪兒哪兒。像我們這類學校在生源上比較困難也就不難理解。所以我們的重點只能立足於自己培養，選拔比較優秀的本科生、碩士生，有目的地進行培養。比如說蒙古族學生，有的滿語、蒙語、日語好，只要給他一定培養，就有發展前途。剛才歐立德教授提到滿學研究的歐洲傳統，確實很重要。我一直學俄語。有清一代唯一長期在北京居住、作為傳教團同時兼有外交使命的就是俄羅斯人。俄羅斯東正教傳教士、留學生，用俄文寫的有關北京城、滿人歷史文化、滿語文，也包括教會活動、宗教信仰等內容的著述多達二百餘部。但正是由於缺乏兼通俄文滿文人才，這

方面研究長期無法展開。所以我們現在從招收碩士生起就注意選拔這類人才。除了懂英語的學生，我們現在更提倡日語，因為研究滿族史首先要重視吸收日本的研究成果，在這點上我跟歐立德教授有共識。可是現在年輕的學生都願意學英文，不願意學日文。至於俄文，現在包括東北地區基本都不學了，所以要尋找會滿文又兼通俄文的學生就比較困難。當然我們也在嘗試，專門從俄語系選拔學生，然後培養他學滿文、讀歷史，循序漸進，一步步深造。

歐立德：我打斷一下，即使是年輕學生比較願意學英文，也可以學日文，學兩種外語不是不可能。

劉小萌：可以，這個不排斥。我的博士生就有自學韓語的。高麗大學去年成立了滿學研究中心，我對他說，你既然會韓語，滿文又好，以後不妨到韓國訪學。你猜他怎麼說？他說他是歐立德教授的「粉絲」，以後要爭取去美國留學。老師的意願是老師的，年輕人的追求是另一回事，他們有他們的自由。從我的角度講，只有努力培養。最大的問題就是我們的學生沒有國際視野，連起碼的國際視野都沒有。單憑我，憑楠木賢道教授的努力，都還遠遠不夠。所以我一再強調，以後學生要走出去，要努力為他們創造條件。

項飆：接着這個國際化的視野，我想問一下歐教授兩個問題。第一個就是，在過去二十多年和中國大陸學者的交往過程中，你看到了一些原來你沒有看到的甚麼東西嗎？他們的視角是不是有一些獨特的地方？第二個更宏觀一點，如果以滿學研究為例子，你能夠給我們講一下一種新的多視角、多中心的，但又高度國際化的歷史研究嗎？就是說，比方像劉教授講的，韓國的滿族研究可能有自己的特色，也是一個中心；美國由於各種資源上的原因，可能是公認的一個中心，等等；但中國也是一個中心……然後各個中心都會有自己的視角。我想滿族研究之所以引起那麼大的轟動，很重要的原因在於它是不同視角之間的爭論，這不僅是史料的準確不準確，而且更是視角的問題。所以今後有沒有可能形成一種高度全球化，但內部又非常豐富、多樣的歷史研究範式？

歐立德：謝謝。我想先回答第一個問題，就是關於大陸學者的視角。我覺得現在無論是甚麼樣的專業，無論是所謂「新清史」還是社會經濟史、文化史，我們現在正邁入一個新的時代。甚麼樣的時代呢？就是說在美國或在歐洲，漢學研究都有歷史傳統。我想強調這個歷史傳統，因為我們每個地方都有，在西方，中國歷史三四百年以前已經開始有人很重視，這個歷史是整個人類的遺產。我們有權利也都有責任去好好照顧那個傳統，我是這麼想的。那麼以前在美國、在歐洲做中國研究的，很多年以後中國的學者才開始稍微有點認

識，或者是有點了解，或者是開始注意。我舉個例子，美國現代漢學創辦人、哈佛大學的費正清(John K. Fairbank)，他的書大概過了三十年以後才開始翻譯成中文。當然，像王教授這種少數看得懂英文的人，看了費正清的書，一定是跟費正清上過課，因為他在哈佛留學的時候是費正清當教授。但是這樣的例子很少。所以費正清和他學生，像列文森(Joseph R. Levenson)的書，例如*Confucian China and Its Modern Fate*，我不知道具體甚麼時候才有中譯本，可能在最近十年以內^③。所以這總存在地方和時間上很大的隔離，把我們兩個學術界分得很開。結果呢，我們習慣用的概念和詞彙都不一樣。比方說1990年或者是更早，1980年代初，我在大陸首次留學的時候，在遼寧大學有個很好的導師，但是我跟他在學術問題上溝通必須創造一種新的語言，做很多解釋才能夠相互了解對方在說甚麼。這需要很大的努力。

我要說的是，現在這個新的時代，距離縮小了很多。譬如說我們今天這個對話，我相信今天晚上、明天，微博上已經有人開始討論。這樣的情況下要創造一種新的後設敘述(metanarrative)，使得我們走的路，我們搞的學問，已經不像以前那麼的分開。這是不是要說是空前的，我不知道，但在我看來是我們以前沒有過的一種經驗，最後也許我們不會講全球中國史學界裏有幾個傳統，而只有一個較為同一的傳統。我覺得給我們每個人的刺激很大，我們負上的責任也很大。所以我看大陸學者的文章和著作的時候，我知道下次到中國很容易找到學者，我們可以喝咖啡，吃個飯；我們現在有共同的語言，在同一個虛擬真實(virtual reality)，同一個虛擬的空間裏，可以進行這麼一個對話。我覺得這是個很重要的新格局，新情況。

說到第二點，從「老外」的角度去看中國歷史，想要了解一下中國歷史。我開始學中文、學中國歷史的目的，其實跟我們的老師細谷良夫教授一樣，就是想多了解中國。從美國人的角度來研究中國歷史不得不從「他者」的角度來研究。一方面這會給我們帶來很多不便，另一方面也會給我們一種優勢；也許中國學者認為理所當然的事，我們反而會覺得不明白，知其所以而不知其所以為然，之後因為以不同的立場、不同的角度作為出發點，有時候會產生新的問題，新的解釋。舉個例子說明，我以前用英文的詞“empire”，用現代漢語說就是「帝國」，我心中的“empire of China”，即中華帝國或者是大清帝國，但我沒有好好想過為甚麼說「帝國」。想久了，我就覺得其實我看的清代文獻裏面從來沒有人講甚麼帝國。為甚麼用「帝國」這個詞呢？「帝國」到底是甚麼？我們說「中華帝國」、「大清帝國」的時候，我們究竟說的是甚麼意思？我們對於「帝國」給的是甚麼定義？我說「帝國」跟劉教授說「帝國」是同樣的嗎？說到這裏，很可能劉教授比較願意說「帝制」而不是「帝國」，因為「帝國」這個詞在漢語裏的含義很複雜。這就給了我一些新想法，對於清朝的整個體制跟以前明朝、元朝，或者宋朝，有甚麼相同或不同之處。這是很膚淺的一個例子，但是我最近在研究這個，所以就提這個。

三 「漢化」問題與「中華民族」概念

項飆：好，謝謝。那我想現在不僅應該把“virtual space”而且是“physical space”打開，邀請大家提問。最好的提問當然是能夠促進他們兩位繼續對話的問題，請大家踴躍提問，因為你們一提問，馬上都會上微博，你們的聲音，立刻會在大江南北得到響應或者是受到攻擊。好，梁其姿教授第一個自告奮勇。或者我們可能採集兩三個問題，然後一起回答。

梁其姿：項教授，你剛才開始的時候說你的角色就是讓他們兩個不打架，其實我想的恰恰相反，你的角色應該是讓他們打架。所以如果他們不打架，聽眾大概就覺得有點不滿足。當然我是在開玩笑。

但是為甚麼大家會對這個對話有打架的期望呢？我覺得並不是因為作為研究工具的滿文在清史研究裏面的重要性怎麼樣，那是很心平氣和講歷史研究方法，這個架大家打不起來。但是如果我們從另外一個角度來看，就是清代歷史在中國現在的國族討論裏面的角色是甚麼，這個可能就會讓大家有些情緒了。我就講我最記得的經驗。我3月的時候在中國大陸，跟一個很重要出版社的一個編輯在聊天，他說最近在國內出版書籍都查得比較緊，很多字就要刪掉，你不能用這些詞，因為上頭會不喜歡。他舉一個例子我覺得很有意思，他說就是不准說「滿清」，「清」就是「清」，不能說「滿清」，意思就是說清代就是中國一個朝代，那就跟宋代、明代一樣。今天一開始劉教授就說他去開會，那個很有名的清史專家說滿人都漢化了，沒有甚麼滿人的。其實這個也牽涉到漢化的問題。今天兩位都欲語還休，就沒有講明白對漢化到底是甚麼立場。當然有關滿人漢化的問題，我們非常尊重的何炳棣教授跟羅友枝 (Evelyn S. Rawski) 教授對談，他是反對羅友枝，認為滿族人有他的“agency”在裏面。他是真的認為滿族人就漢化了。當然何教授是一個非常傑出的歷史學者，他沒有用滿文來做研究。那我想問兩位，你們用滿文作為研究清代的工具，對你們研究有關漢化的歷史過程會有甚麼影響？你們兩位對漢化的看法到底是一樣還是不一樣，會不會打起架來？

徐國琦：這個打架問題，劉教授剛才說要求同存異，歐教授是西方學者，劉教授是大陸學者，你們「同」在甚麼地方，「異」在甚麼地方？另外，還有一個接着打架的話題，你提到中華民族和滿族，歐教授也提到，因為「中華民族」這個概念實際上直到二十世紀初才存在，那麼滿族人他們當時認為是中華民族的一部分，滿清是中國的一部分，還是有不同的界定？

項飆：那我們先就這兩個問題打一下。劉教授先出手，還是歐教授？

劉小萌：那無所謂了，我當靶子也無所謂。剛才我也說了，求同存異。剛才說的是「同」，現在就轉入正題了，該說「異」。因為我來之前，就有老師跟我

說，從網上看的，說這叫「世紀之辯」。我說「辯」甚麼我們也不清楚，但有些重要問題確實應該談一下。

那「同」在哪兒？我先簡單地說一下我們兩個人的「同」。專業相同不用說了，重視從滿族角度研究是我們的「同」，包括用滿文。更加重要的是，我一直研究八旗，歐立德教授也是研究八旗制度，但在這個問題上我們是有分歧的。歐立德教授研究八旗制度，基本上強調的是八旗作為一個封閉的制度——這是我的理解——怎麼塑造了滿族族性，正是由於這一點，才使清朝統治維持了將近三百年。而我研究八旗制度，則是延續大陸學術界傳統，主要研究在八旗制度的阻隔下滿族人和漢族人的實際交流是怎麼發展的。換句話說，八旗制度的封閉性是怎麼一步一步被破除的。我想在這一點上，我們兩個人是有不同，可是單憑這一點不足以引起我們兩人拍桌子。為甚麼？我也在反思這個問題，實際上我們是從不同角度考察同一個對象，實際是一種互補關係。當然也有差異，但我覺得在互補基礎上，還是應長時段地考察這個問題，八旗制度的封閉性被逐步破除，是一個顯而易見的事實。

說到滿族是否「漢化」，過去習慣用「漢化」這個詞，後來覺得這個詞帶有某種強制性單向灌輸的意思，現在大家都排斥這個詞，改稱「涵化」。「涵化」有文化相互融通的含義，這一點已經進步了。可是長時段地看，滿族人確實是接受了漢文化，或者準確地說，不是漢文化，而是中原文化。事實上不單滿族是這樣，我們看歷史上那些少數民族，如遼契丹族、金女真族，包括後來進入中原的蒙古族，無一例外都接受了中原文化。過去我跟定宜莊教授去田野調查，無論在雲南、福建，還是四川，也有居民說他祖先是蒙古人，還有居民說他祖上是女真人。比方說福建泉州粘氏，女真金兀朮後人，其宗族



《親藩習射圖》卷(局部)，清人繪。絹本，設色。52×170.3 cm。故宮博物院藏。(圖片來源：故宮博物院編：《清史圖典：康熙朝》[北京：紫禁城出版社，2002]，頁117。)

現在分布在海峽兩岸，他們早已歸入漢族。當我們說到「漢化」問題時，我覺得這個詞語本身就存在問題。甚麼問題呢？漢代的漢人跟我們說的清代的漢人、現代的漢人，是不一樣的，區別很大。大家知道，漢代人並不自稱漢人，而稱秦人，秦人已經是多民族融合，後來始有漢人之稱。先秦時中原有五族，北戎、西狄、南蠻、東夷，中間是華夏。戎狄蠻夷哪兒去了？北朝一百九十三胡姓哪兒去了？到五代十國，五胡亂華，五胡哪兒去了？包括鮮卑人、契丹人、女真人，都哪兒去了？絕大部分都被同化為漢人，是沒有問題的。所以當你說漢人的時候，我首先會問，你說的是甚麼時候的漢人。漢人本身就是許多民族成份不斷融合「滾雪球」般壯大的群體，我曾經用一個比較粗俗的詞來形容，即漢人是最大的「雜種」。這當然沒有貶義，而是就族緣、文化的多元性來說的。所以當我們用滿族「漢化」來表述，是有問題的，我覺得用「中原化」更準確、更科學。因此，當我們談論「漢化」話題時，我更願意從後來意義上的多民族混合的前提下來談漢人與其他民族的關係。這是我想強調的一點。

至於中華民族，我知道西方學者在這個問題上的主流觀點，一種認為中華民族是虛構的，甚至說中華民族的建構到現在也是不成功的，是失敗的。可是從我個人來講，我認為上述觀點有問題。為甚麼這麼說？「中華民族」稱謂是清末出現的。當初提出這一觀點最積極的，是立憲派代表人物楊度、梁啟超，可惜在政治上他們被孫中山的革命黨鬥敗了。而孫中山的民族理論以「驅逐韃虜，恢復中華」為口號，實際代表了那個時代中國人在民族理論上最極端最狹隘的一翼。中華民族的理論為甚麼在清末提出來？我認為背景有幾點。

首先是統一多民族國家的形成。清乾隆一朝，在中國歷史上締造了一個史無前例的大一統國家，嘉慶朝編纂《大清一統志》，把廣大邊疆地區全部納入清朝疆域，這是一個大的歷史背景。

其次是近代以來西方民族理論的傳入。隨着中國留學生走出國門，尤其甲午戰爭以後，大批學生到日本留學，開始在西方民族理論基礎上重新思考國內民族問題，進而認識到在一個個單一民族之上，必須有一個涵蓋清朝疆域內所有民族的專用詞，即中華民族。

再者，談到中國的民族認同、國家認同、中華民族認同，不能脫離當時的國際背景。近代以來，中國面臨的最大問題就是內憂外患，相互作用，因為西方列強來了，然後到清末是帝國主義對中國的瓜分侵略，到民國則是日本帝國主義對中國的全面入侵。正是在列強入侵的背景下，大大強化了中國人的中華民族意識。這一點有大量史實為證，可是恕我孤陋寡聞，西方學者很少從這個角度理解中華民族的形成。所以，在中華民族認同問題上，不是具體哪個民族的認同，而是涉及到中國各個民族。我可以舉一些具體例子來說明，包括滿族人對中華民族的認同。清末有一個有名的滿洲貴族叫盛昱，他寫過一首詩，其中有「起我黃帝胄，驅彼白種賤」句。「白種賤」帶有貶義，指西方殖民主義者。他稱自己是「黃帝胄」，當然不能作窄義理解，說他自認是漢人，而是廣義的，意指我們都是中華民族的一員，在反對外來侵略鬥爭

中，我們應該不分民族聯合起來，共禦外侮。許多滿族政治家、文學家都有過類似表述。當然咱們現在不是舉例的時候。我先說到這兒，希望歐立德教授能提出不同意見，然後我們繼續討論。

歐立德：謝謝。我想，我們對中華民族的看法的確不一樣。但不一樣在哪兒呢？就像你剛才提到的，西方對於中華民族形成的理解，主流是說它失敗了。但我會說，我不覺得主流的解釋是說中華民族失敗了。

劉小萌：我說是一種觀點。

歐立德：好，是一種觀點。這個我也寫過，我寧願說它還沒有成功。我覺得這是民國初期的一種理想，人民知道世界上有民族國家這麼一個新政體（new political form），我們必須適應。怎麼適應呢？為了成立自己的民族國家，我們中國要創造自己的一個民族，就是中華民族。這個中華民族應該是怎樣的？誰來參加呢？這個問題，當時有各種爭論，到現在為止也還是有爭論，大家想法都不一樣，對嗎？

劉小萌：嗯，對。

歐立德：甚至於我在演講的時候，我會問學生，尤其是中國的學生，有沒有人以「我是中華民族的」來說自己？有人說「我是漢族」、「我是維族」，或者是「我是中華人民共和國的公民」、「我是台灣人」等等，但很少聽人說「我是中華民族的」。我不是說沒有人，我知道有時候有人在某一些很特殊的情況下會強調說「我是中華民族」。但一般來說，這不是人們常用的一種說法，並以此來設想自己在社會裏面的民族身份或地位。當然，人們也許有一天會這麼想，但是如果看今天中國的周邊，我們很快也很容易發現「中華民族」這個概念不是到處都受認同的。請恕我這麼說吧。

剛才梁其姿教授提到漢化問題，我想我們在這方面也應該討論一下。畢竟這個問題是當初大陸學者之所以對「新清史」感興趣的原因所在，就是因為「何羅之辯」這麼一個辯論觸發。其實我覺得何炳棣教授與羅友枝教授各有道理，問題在於他們對「漢化」這個詞的不同理解。

我想何教授的意思是說，滿洲人在統治中國的過程中受漢人、漢文化、中原文化的影響很深，如果以這個定義來說明「漢化」，那說滿洲人沒有「漢化」是個很荒唐的理論。就這方面來說，我同意何教授，也同意劉教授。也就是說，如果堅持說滿洲人一點沒有受中原文化的影響，的確是無法接受的觀點，因為證據太明顯了，事實上滿洲人自己當時都承認。我們只要看檔案，十八世紀的時候，皇帝、官員，乃至周圍的旗人、滿洲人，說的都已經是漢語而不是滿洲話了。所以，如果漢化是指受中原文化的影響，那問題就該解

決了。甚至也可以說，我也漢化了，因為我也受中原文化影響很深。但是，如果我們要給「漢化」另外一種解釋，說「漢化」是把非漢人和漢人之間的區別完全消滅掉，把非漢人改造成漢人的話，讓他們認為自己其實就是漢人，然後同時讓周圍的漢人認為他們原來以為是非漢人的，其實就是跟他們一樣的漢人，那這個對於「漢化」的定義就有問題了。回到我剛才舉的例子，我雖然在第一個定義下漢化了，但是在第二個定義下，我當然沒有漢化到那個程度——在那個意義下沒有漢化，也永遠不會漢化。

這就是羅友枝教授的意思，也就是說滿洲人雖然在很多方面，例如政治、宗教、藝術等等，都受中原文化影響，但他們最終畢竟還是保留了與漢人不同的認同，沒有把他們自己看作是漢人，漢人也沒有把他們滿洲人看成是漢人。怎麼能證明這個呢？我用滿文的資料為例回答你剛才那個問題。如果我們只用漢人解釋滿洲人的情況的資料來考慮問題的話，那我們的考察只能是片面的；同樣，只用滿文的史料也有不足，那也是片面的。這不是說滿文的史料是真實，漢語的史料是虛假的，並不是這個意思。不論滿文抑或漢語，都是史料，同樣都有問題，這個必須要以老師教會我們的方法去作評價、分析。但是，我們用滿文的史料就比較容易能夠看到滿洲人怎麼理解他們自己的歷史地位、在社會裏面站在甚麼位置。看了這個之後，很明顯地，他們沒有把自己當作是漢人。我想，何炳棣教授其實會接受這一點的，可惜他和羅教授沒有這樣一個對話機會展開討論……這就提醒我們，像我剛才說的那樣，在對話的時候必須先弄清楚我們的語言、用詞和術語。連「大清國」、「中國」在某種意義上也是術語。剛才徐國琦教授問大清國是中國還是怎麼樣呢，我會說大清國是中國的一個表示，一個表現。但是我們思考這個問題的時候，就得問自己，我們說的「大清國」或「中國」是甚麼呢？我們說的是甚麼時候、哪個朝代的中國？是甚麼樣的大清國？

這也就是為甚麼我們到底怎麼理解大清國、怎麼理解中國會變得如此重要。我們使用這些術語時必須很謹慎，而我覺得歷來我們還不夠謹慎，這也包括我自己在內。不知道這樣討論有沒有達到梁其姿教授所說的打架的效果？

項飆：雙方似乎還在熱身。但由於時間關係，只能再有一輪的問題。

歐立德：我們是不是可以先讓劉教授回答漢化的問題……

劉小萌：這個問題涉及頭緒太多，我就簡單回應一下。首先，你說中華民族到現在「還沒有成功」，但我寧願說它是在形成過程中。當然如果你的意思是說還沒有完全成功，那麼在這個意義上，我也贊成。美國有一位著名的華人學者叫唐德剛，他在談到中國現代化轉型時說過，從近代到現在一百多年過去了，中國的現代化轉型還沒有完成，這個觀點我贊成。同樣，如果中國的現代化轉型沒有完成，那我想真正意義上的中華民族的形成也沒有完成。這是第一點。

第二點，我剛才也強調說，中華民族不是虛構的，而是歷史中形成過來的一個龐大群體，在很大程度上我認為它的形成是成功的。為甚麼這樣說？首先，在中國五十六個民族中，漢族人佔絕對主體，剛才我已經說過，它本身就是由不同民族成份匯合成的。漢人分布區大概佔到中國一半，可是從人口講，佔有絕對優勢。這是中華民族的一大特色，大概跟俄羅斯等多民族國家還是有些差別。這種凝聚力是中國的一大特點。大家也知道，每到春節，所有中國人都要回家，包括香港同學也回家探望父母、親友。前段時間我看《參考消息》引國外一段評論，感慨說有幾億中國人集中在這個時間回鄉探親，說這種現象充分顯示了中國人的凝聚力，只要這種現象存在，中國就不可能分裂。這種現象當然別的國家也有，可是在如此強烈的鄉土意識、親情意識驅動下，途中克服那麼多的困難，飽嘗那麼多的艱辛，不同階層、不同性別、不同知識結構和思想觀念的人們，大家都有一個共同追求。這種追求，這種凝聚力，在談到中華民族話題時是一個很重要的、不能不考慮的因素。

至於說中國國境內有一部分人不認同中華民族，或者不使用「中華民族」，因為大家經常說「中國人」、「你是不是中國人」。我跟學生經常講，你們要盡量學習西方的東西，包括「新清史」，可是你們是從中國人的角度來治學，不要甚麼都拿過來照抄，這我是反對的。

歐立德：但我會說，你要從做學問的角度來想。我個人不是這麼重視國籍。

劉小萌：對，國際化的視野，這並不矛盾。談到認同，我想在美國居住的移民很多，甚麼民族的都有，他們是不是都認同美國？我想好多人由於種種原因，也未必就認同美國。所以，如果說中國的一部分人不認同中國，不認同中華民族，我覺得也很正常。當然中國的這種不認同，複雜性要超過美國，這點我承認。原因是多方面的，這裏就不展開了。

在現有情況下，我們應更多考慮中國非漢民族的利益和呼聲，這點我也贊成。前提是他們是中國人，即便他們中的一部分不這樣認為，具體地說如新疆的維族，可能他們不認同的人比較多；我接觸過的蒙族人也有一些，他們就不認同。可是別忘了，新疆僅伊犁地區就有二十多個少數民族，我的錫伯族學生，他們都有很強烈的中國認同，他們不希望新疆被伊斯蘭化，他們同樣希望自己有一個比較自由的、民主的生存空間。所以我想應該這麼認識這個問題。當然我在海外比如在法國也接觸過維族學生，包括中央民族大學畢業的，他們知道我在民大學習過，很友好。由於種種原因，他們一些人不認同中國或中華民族。可是這種不認同是天然生成的呢，還是在某種程度上受到西方影響的呢？或者更直截了當地說，在研究問題上，他們要是按照認同的觀點來寫論文的話，我估計在申請資助或者其他方面，也可能會有難度。這是我從一個中國學者角度來考慮問題。

四 地域、民族與政治

項飆：要不先再搜集一輪問題，好嗎？

提問者甲：我的問題是，我看到最近在中國社會科學網上有一位學者叫做鍾焯，他指出了柯嬌燕 (Pamela K. Crossley) 教授的一些書出現的錯誤，並且認為柯嬌燕教授是出於美國學者的視角和觀點。然後柯嬌燕教授在自己的個人網站上回應鍾焯的文章。我讀了這些文章之後，感興趣的一點是，請問您覺得在研究歷史、研究這樣一個話題的情況下，來自不同國家的學者如何能避免自己個人的偏見？尤其是中國的學者，如何能跳出自己作為一個中國人的觀念、思維方式，來客觀地看待民族問題？比如說有很多中國人會有一種漢族至上的漢族沙文主義或是大中華主義。這是我感興趣的一點。還有像歐立德教授剛剛提到「帝國」這個概念，好像中西方學者對這個概念有不同理解，那在這種情況下如何建立一種共同的基礎 (common ground)？然後在這個共同的基礎上，中西方學者可以有一個有意義的溝通和交流？

提問者乙：歐立德教授大概去年還是前年的時候發了一篇文章，在註腳裏面提到「是中華民族」這種說法，我讀到的時候覺得有一點奇怪，因為我自己是研究蘇菲的，其實是研究回族的，我聽到過很多人會講「我屬中華民族」，然後說「我是甚麼甚麼族的」。我當時就有一點奇怪。我覺得英文裏面“identity”和“belonging”這兩個詞分得更清，這兩個概念雖然會有交叉重合，但不一定是一樣的東西。為甚麼他在講到中華民族的時候說「我屬」(belong)，然後在講別的東西的時候會說「我是」？我覺得這個可能是一個有趣的問題，是我自己在調查當中發現的。

第二個問題，其實剛才劉教授講到「中原」，這個概念在我自己的研究裏面非常重要，因為回族對自己族源的講述就跟中華民族的講述是一樣的。他們講，我們就是由於阿拉伯人、波斯人、中亞人，各種不同的民族與漢人之間結合的結果。所以他們的族源本身不是一個核心，而是所有的聚到一起。但這樣一種講述的核心其實是土地，這種結合是在這塊地方發生的，所以我們是中國人。而劉教授剛才講的「中原」的概念也是一個「地域」(territory) 的概念，而這樣一種關於地域的爭論，其實 1990 年代何炳棣教授就提到清代的遺產 (legacy) 裏面一個非常重要的就是疆域。當然這個現在也是一個很敏感的問題。所以我想問兩位老師，在您兩位對於滿族的研究當中，對於這種“legacy”或者對於族群的研究當中，“territory”處在一個甚麼樣的位置上？它重不重要？或者說是在兩位的學術框架裏面有甚麼樣的作用？

項飆：好，還有其他甚麼問題嗎？最後一個機會……好，沒有，那就最後一輪對弈。

劉小萌：還沒打起來呢。歐教授你先講。

歐立德：我先講。這些問題都問得很好，其實我們可以談很久，談不完。

鍾焜和柯嬌燕之間的交流，我覺得很正常，這個不見得只有因為某人是中國人、某人是美國人，所以才有這麼一個爭論。這個我覺得說不通。要在大陸學者當中找一個想法和柯嬌燕教授類似的，或者對柯教授寫的東西基本上都贊成的，也不難。我不認識鍾焜，沒跟他接觸過，他不滿意、不同意柯教授的書、文章，並覺得有問題，因此覺得有責任要發言，這在學術界裏面是很正常的行為。但我會覺得有時候他說得是不是有一點兒太極端了，是不是有一點兒過於吹毛求疵？那種做法，不願意承認柯教授的觀點裏面的任何東西有任何一點價值，這可能值得商榷。另一方，你學者出了文之後，人家在攻擊你的時候，很容易想，他不理解我要說的意思，我要回答，要辯護自己的看法。到最後，我想是年輕一代的學生自己要決定這個辯論的價值在哪兒。當你看他們兩位在爭論甚麼問題的時候，你可以考慮這對你自己有甚麼啟發，讓你想到甚麼，讓你更想知道甚麼，從而讓你找一個更好的回答。我這麼想，如果真能達到這個效果，那就算是成功的爭論。

剛才這位朋友提到關於「我屬中華民族」和「我是中華民族」的問題，我沒有從這個角度想過這個問題，以後我會以這個為參考，會去想。確實因為語言問題，中文的用法和英文當然不一樣，套用一種語言來想第二種語言當然是很大的一種錯誤，我想在我們的工作當中，天天在做翻譯，我們看中文的或者是外文的東西，把它翻成自己母語的時候，也會犯錯誤，所以只好更加謹慎。

最後的問題是關於地域和族群的，其實這個問題要展開的話也說來話長。簡單地說，我當然覺得地域很重要，我們只要看清代的地圖就知道上層、中層的人，政府裏外的有識之士，對於地域這個問題都很感興趣；在科技上、思想上，對於地域的想法也有各種方面的變化。下個禮拜在香港科技大學圖書館裏面有個展覽，科大有很好的地圖收藏品，這些地圖對於認識清代對於地域的理解很重要。可惜的是，最寶貴的地圖收藏在中國第一歷史檔案館，而該館至少二十五年以來不讓學者看他們收藏的地圖。據我所知，這個不是針對外國學者，也包括國內學者。這個劉教授當然比我熟悉……很難很難看到，大概有上萬的各種地圖。除非我們有那種史料，這個問題恐怕不太好回答。我知道李中清教授有一次看到一些……

李中清：……才幾千。三千，三四千完整的……

歐立德：才三千。再加上那些小地圖的話……一共多少？誰知道。

劉小萌：台灣有一大部分，1949年前被國民黨帶走了。

歐立德：對，台灣也有。

劉小萌：時間也不多了，那我也簡單地談一下吧。我覺得現在在跟「新清史」的對話中的一個趨向，好像是批判性愈來愈強。可是為甚麼我過去不太願意介入「新清史」的批評或者討論？一個，說私人關係吧，我們是師兄弟。我的師姐定宜莊教授也一再提醒我，歐立德教授可是你師弟啊。我跟定教授在「新清史」問題上也有些分歧，這個大家都知道。有人想邀我們對辯，可是我更珍視我們之間的友誼。這次對話是個例外。你們很少見我發表意見，其實我是有想法的……

歐立德：你說是想法，我會說是你的意見，對吧？都是客觀和主觀之間的。

劉小萌：對。因為大家走到這一步，做共同的研究，無論是海外的學者、國內的學者，大家都很珍視——除了學術交流，還有一份友誼。雖然我們有分歧，可是我們要珍視這份友誼。

至於批評，我覺得正常的批評、探討能推進研究，而且正是在這種批評或者探討中，「新清史」的影響其實並沒有縮小，反而在某種意義上還擴大了。現在許多人都關注這個話題，早已不限於滿族史這個小圈子，還包括相關的學術領域，我會說某種意義上這是成功的。我們現在最反對的是用文革方式、語言來扣帽子。在大陸，有些文章措辭很尖銳，批甚麼「新帝國主義」。那個報知道我對「新清史」有批評，也向我約稿，我當即就拒絕了，我說你這個報是極左平台，我不會在你這兒發表一個字。關於與「新清史」的分歧，我願意把它納入學術範圍來討論。

歐立德：就是說不要把我們的學術對話太政治化。

劉小萌：擺脫政治化，是我們對話一定要遵守的原則。可是我現在最困惑的，就是這個話題在某種意義上確實又牽扯上政治。我一直在琢磨這個問題。比如說美國「新清史」一些學者，批評中國的清史研究，總認為你們是民族主義思想，甚至說你們代表官方意識形態。最近台灣的徐泓教授專門寫了一篇批評「新清史」的文章，特別舉出美國學者的研究帶有政治性的例子^④。後來我就反思，美國「新清史」有沒有政治？

歐立德：當然有政治，做學問都有政治。

劉小萌：對。美國學者一直說自己是進行純粹的學術研究，我們也承認，起碼在座的歐立德教授或者別的教授是真正的學者。可是問題就在於，當我們談到中國的邊疆問題，談到中國的民族問題時，對中國人來講，這本身就意味着有很大的政治性。尤其美國「新清史」，他們談到中國的民族關係時，所有的關注點不是民族的融合，而是民族的對立，包括滿漢關係。這一點是中

國學者——我也希望在這個場合提出來，就是一方面我們要把對話限定在學術範疇，另一方面也要考慮到由於雙方文化背景、政治理念的差異，不能不承認觀點背後的政治性。換句話說，對中國學者，你們可以說我們有政治性，而我們現在也普遍認為美國的學術背後同樣有政治性。如何對待學術背後的政治性，我覺得是一個比較困惑的問題。

一些美國學者說，研究中國應摒棄以西方為中心的觀點，也就是要從中國角度進行研究，進而提出從滿族角度研究清史。現在不少中國的學生也這麼說，說我從滿族角度如何如何研究。前兩天我參加一個博士論文答辯，答辯者說他是從英國視角研究晚清西南地區的法英中關係。後來我就提出一個問題：「你用的資料主要是英國檔案，這是否就意味着你是英國視角呢？」換句話說，當美國學者說他們用中國視角或滿族視角研究中國時，他們有沒有主觀性？作為西方學者，他們的文化素養，西方的這套文化系統對他們的影響，是非常深的。當然我自己也是一樣，首先肯定沒有人認為我是官方代理人——這幾天適逢文革五十周年，我還接待了好幾位海外記者。因為當局禁止談文革，只能借助海外媒體發聲。可是作為一個中國學者，在專業研究領域，不等於我就贊同美國「新清史」的一些觀點。說得簡單點，這在很大程度上就是文化差異使然。我在2010年〈清朝史中的八旗研究〉那篇文章中說過^⑤，有些觀點歧異，通過討論是可以彌合的，但是也有一些歧異，即使通過討論恐怕也難以陶融。中美學者，各有自己的國情，存在着文化背景、歷史傳統、學術環境、研究角度、理論方法的諸多差異。「新清史」無論怎麼強勁，畢竟是在異文化的視野中觀察中國，而運用西方理論和話語系統詮釋中國歷史，始終存在一個是否符合中國實情的問題。大陸的一些年輕人，盲目接受西方和美國「新清史」觀點，然後就拿來生搬硬套。這個現象可能也是招致大陸學界對美國「新清史」持批評態度比較大的一個原因。中國是一個大國，過去總講佔世界人口四分之一，即便將來有一天完全走向現代國家了，完成現代化了，那它的中國史研究——這麼一項非常本土化的學科，還是會有自己的獨立立場、角度和話語，不可能因為走向全球化，我們就完全使用西方的話語、西方人的思維，這是不可能的。這是需要說明的一點。

另外，我再簡單說幾句，關於地域觀與民族認同的關係問題。「地域」是非常重要的概念，剛才有學者問到它與滿族認同的關係，我就想舉一個例子，為甚麼在光緒年間，1884年、1907年，清政府把東北地區和新疆從將軍制改為與內地劃一的省制或者說府縣制？清政府用政治制度一體化來應對國外列強，尤其是沙俄、日本對東北、西北邊境造成的巨大危機。我覺得這是一個因素。另外在這個過程中，中國的滿族人也好，東北的滿族人也好，他們的觀念發生了變化。東北是滿族故鄉，滿洲統治者在東北長期實行封閉政策，禁止漢人進入，到後來卻主動開放東北，歡迎漢人到來，動員組織漢人開發、建設邊疆，以阻止外國列強、日本、俄國侵佔我們的一寸土地。這

反映了滿族地域觀的深刻變化，而這種變化實際也反映了中國各少數民族，包括滿族，對國家的認同、彼此間認同的變化。

最後還想舉一個滿族地域觀變化的具體例子，最近我正在研究八旗會館。大家知道清代滿人以八旗制度為本族組織，是一個相對封閉的群體。然而到了近代，在中國各地大量會館中，有一類非常特殊的會館，就是八旗會館。各地八旗會館的成員不是只有旗人，同時吸收直隸人、山東人、奉天人，這四類人以旗人為核心，共同組成一個會館。這就反映了滿人地域觀的深刻變化，就是「我們是同鄉」。這種認識已完全超越狹隘的「旗人」意識、「滿人」意識。

項飆：歐教授，非常簡短……

歐立德：很簡單，兩點。一個是對於以中國為中心 (China-centered) 的研究方法跟以滿洲、大清為中心的研究方法，怎麼做評價。這個我覺得我們還是要重視，要取得一個平衡。你說對了，國內學者在談滿漢關係的時候，強調的是滿漢之間的關係多麼平穩，多麼友好；西方強調的是滿漢之間的對立和摩擦。事實上，以前根本沒有人注意過滿漢關係，這不是一個話題。為甚麼現在就變成了一個話題呢？是因為我們發現在滿文檔案裏面，確實存在某種程度上的滿漢之間的緊張，有時候會爆發。我們即便是強調這個對立的時候，也不是說他們天天在市場裏面吵架、打架，不是這個意思。但是他們群體之間往往存在着一種緊張，而這一點我們研究清史的人要是不了解，就不可能了解朝廷，尤其是十七、十八世紀的時候，朝廷裏面的人際關係是怎麼回事。我想這一點劉教授你或許會同意。

劉小萌：嗯。

歐立德：我知道，人們批評「新清史」的時候把這個對立看作是非常負面的。我想寫歷史不要只看負面的，同樣也不要只看正面的，這兩個層面都要承認。最後我想說的是到底有沒有純粹的學術這個問題。我們得承認，我們都躲在自己那個小洞裏面做學問，像青蛙，坐井觀天，很難窺全豹，但我們盡力而為，畢竟我們每個人都有限制。說背後有政治左右，那倒是，但我還是要說明白一點，在美國政治背後的作用，跟在大陸政治背後的作用不是一回事。在美國要出書的時候，不需經過審查，沒有人在說「這個字你不可以用，那個字不可以用」，沒有人管，你願意說甚麼就可以說甚麼，這個大家都知道。我要強調的是，你們國內做學問、發言所受的限制，要比在美國多得多。這個我想我們不要因為政治背後的作用，覺得美國學者跟中國學者處於同樣的格局裏面。不一樣的……

劉小萌：我不反對。可是呢，分歧……

歐立德：在中國做學問不容易。

劉小萌：不容易。大家也知道，除了滿族史我還研究知青史，可是我的再版書今年就出版不了。

項飆：我很遺憾不得不結束這一場對話。我想大家都會同意劉教授提到的網絡上的預測，這個辯論可能是一個世紀之辯，所以那麼精彩。像劉教授提到，正是因為這個辯論當中有很多挑戰和困難，也因為這些困難，刺激我們更好地思考，逼着我們走出自己原來那個安舒圈 (comfort zone)，去面對原來不想面對或者原來沒有想到的這些問題。所以這個對話是你們過去二十五年之間交流的總結。

劉小萌：是開端。

項飆：對我們和在座的各位同學是一個開端，所以我們的任務可能是把這個對話繼續下去，不要因為它的艱難而迴避。而正是因為它的艱難，我們要把它保護下去、持續下去。當然要思考怎麼樣使這個對話更加有效，就是像歐教授講的那樣，怎麼樣在對話中從對方那裏學到東西，共同促進我們的研究。好，謝謝各位。

註釋

- ① 至於「歷史主題」的詳細解釋，參見定宜莊、歐立德 (Mark C. Elliott)：〈二十一世紀如何書寫中國歷史：「新清史」研究的影響與回應〉，《歷史學評論》，2013年第1卷，頁116-46。
- ② 復旦大學文史研究院編：《從周邊看中國》(北京：中華書局，2009)。
- ③ 列文森 (Joseph R. Levenson) 著，鄭大華、任菁譯：《儒教中國及其現代命運》(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00)。英文原版包括三卷，由加州大學出版社1958至1965年出版。
- ④ 徐泓：〈「新清史」論爭：從何炳棣、羅友枝論戰說起〉，《首都師範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2016年第1期，頁1-13。
- ⑤ 劉小萌：〈清朝史中的八旗研究〉，《清史研究》，2010年第2期，頁1-6。

項 飆 牛津大學人類學院教授

劉小萌 吉林師範大學滿族文化研究所兼職教授，中國社會科學院近代史研究所研究員。

歐立德 (Mark C. Elliott) 哈佛大學東亞語言與文明系、歷史系講座教授，暨國際事務副教務長。